

论毛泽东的文化自信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陈邵桂

(湖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近代中国出现过拒绝接受外来文化和全盘西化两种极端现象,其根源都是缺乏文化自信,既影响了近代中国文化建设又影响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文化充满自信,并从历史和现实依据以及方法论等方面论述了文化自信的问题,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处理传统与当代以及中外文化关系提供了科学的文化观,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关键词]毛泽东;文化自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A84;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7)05-0083-05

Discussion on Mao Zedong's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CHEN Shaogui

(School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ere have been two attitudes towards western culture: either refusing to accept it at all or a total westernization. Both phenomena are results of a lack of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have impacted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progress. Mao Zedong was very confident in Chinese culture and had elaborated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from historical, modern and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s. He provided a scientific concept of culture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and foreign cultures, and thus realized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won the great victory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Key words: Mao Zedong; cultural confidenc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文化自信是正确认识、处理传统与当代以及中外文化关系的科学文化观,只有这样,才能推进文化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毛泽东的人生是充满自信的人生。毛泽东在早年就豪情满怀地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1]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文化是充满自信的,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提出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 近代中西文化论争与毛泽东文化自信思想的形成

在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的历程中,毛泽东逐步形

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文化观,即文化自信。

(一)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的两种主要观点

中华民族古代文化发达且历史悠久又从未中断,因而具有传统文化优越感。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国家处于被动挨打的窘境,先进的中国人在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时大声疾呼“师夷长技以制夷”,^[2]可是也有人提出“何必师夷人”的观点。^{[3]69}后来,又有人提出既有进步性又具有束缚外来文化传播属性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3]71}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收稿日期: 2017-07-14

基金项目: 湖南省毛泽东研究中心基金资助重点项目“毛泽东文化自信思想及其现实意义”(16MZDYJWZ05)

作者简介: 陈邵桂(1956-),男,湖南新化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之说又出现了新的版本——“本位文化”论。^{[3]109}据冯友兰回忆:“1935年,上海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这篇文章,又称为‘一十宣言’,因为它是在1935年1月10日发表的,最先登在1935年1月10日出版的《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4期上,后来各报各杂志均转载……这个‘宣言’是国民党授意作的。一篇洋洋大文,实际所要说的,只有三个字:‘不盲从’。不盲从什么呢?不要盲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以俄为师’。这是这个‘宣言’实际上要说的话,其余都是些空话。”^{[4]131-132}与之相对应的是针对文化思想上顽固守旧的观点,胡适提出了“全盘西化”的观点。他在《充分世界化和全盘西化》一文中,针对“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存在“抵抗西洋文化”和“选择折衷”以及“充分西化”等3种主张,提出“主张全盘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的观点。^[5]就近代中国的文化建设而言,胡适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此,冯友兰分析:“同‘文化本位’论正面对立的,是‘全盘西化’论……胡适主张‘全盘西化’,这并不使人惊异……他所主张‘全盘西化’的理由,似乎有点特别。他似乎也认为‘全盘西化’的主张有点极端,但又认为只有主张极端,才能在实际上‘化’得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是个什么样子,他没有说。”^{[4]133}可见,“全盘西化”怎么“化”,胡适也是不明确的,只是针对“文化本位”顽固守旧的观点,从另一个极端提出问题而已。

上述两种极端的观点都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拒绝接受外来文化者担心外来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冲击,也就是对民族文化缺乏基本自信的表现。全盘西化论者看不到中华民族文化的优势,同样是缺乏文化自信的。

(二)毛泽东文化自信思想的形成

汤用彤在抗日战争时期撰写的《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一文中,论述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怎样建设近代文化的两种观点,即:“有人主张用中国文化作本位,有人主张全盘西化”,并认为“直到现在,这个问题犹未决定”。^{[6]493}汤用彤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在理论上必须回答和解决的。毛泽东从历史和现实发展的规律中,寻求回答和解决问题的方案,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文化观即文化自信思想。^[7]

首先,毛泽东论述了文化自信的历史依据,从

历史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他在很早的时候就说过:“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8]基于此,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9]534}毛泽东是善于运用历史智慧的,上述即是从历史上探寻文化自信的依据。

其次,毛泽东论述了文化自信的现实依据,从现实生活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毛泽东认为:近代中国存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以及“新文化”等文化形态。^{[9]694-695}他定义的“新文化”是:“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毛泽东所说的“新的经济力量”即在近代中国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所谓“新的政治力量”即“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9]695}由此说明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因此,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9]698}文化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密切相关的,由于近代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9]706-708}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新文化的内容进一步予以界定:“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9]708-709}这就表明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新文化,是以人民大众为价值主体的表现人民主体价值观的文化。这也是毛泽东文化自信的现实依据。

再次,毛泽东论述了怎样做到文化自信的问题,即文化自信的方法论原则。文化自信即科学的文化观,需要有科学的方法,也就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古今

及中外文化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设新文化。

关于对待外国文化的科学方法,毛泽东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9] 706-707}文化的传播属性决定了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的必然性,可是,这种学习“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显然,“全盘西化”是错误的主张。

关于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方法,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9] 707-708}毛泽东还说过:“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9] 708}文化的传承属性决定了古今文化发展延续和继承的必然性,可是,这种延续和继承“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关于继承和吸收中外文化建设特别是中国近代民族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方法,毛泽东认为:“我们决不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 and 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10] 860}毛泽东还指出:“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人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收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11]文化的传播属性和传承属性决定了文化的中外交融和古今延续的必然性,而更为关键的是要明确:“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继承必然要有所创新,借鉴和吸收则要与近代中国的国情相适应。

上述即是毛泽东对当时急需解决的中国文化

如何发展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文化观即文化自信,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二 毛泽东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近代中国出现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种态度

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际,先进的中国人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不得,他们的各种尝试,其中包括辛亥革命这一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都最终失败了。也就是在这时,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开始了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传播,先进的中国人由此看到了新的希望。正如孙中山所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12]1949年7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对这一段历史进行过如下总结回顾: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21] 1469-1470}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准备也作了干部准备。可是,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也有过两种不同的际遇。

一是“中国文化本位”论的“不要盲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以俄为师’”。文化自信不是妄自尊大,不是自我封闭,也不是拒绝学习外来文化,而是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和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人民在近代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相互关联的历史发展进程,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决策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历史发展的规律及趋势。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就确信马克思主义是救国救民的真理。1936年,他在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过:“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3]这才是充满文化自信对待外来先进文化的态度。

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不一样的是,如前所述,正如冯友兰所指出的,作为中西文化论争的一极“中国本位文化”论,就是主张“不要盲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以俄为师’”。这种拒绝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做法,除了在政治上逆历史潮流而动以外,在文化观念上与鸦片战争以后拒绝学习外来文化的观念一样,显然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

二是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脱离近代中国国情实际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文化自信不是妄自菲薄照抄照搬外来文化,而是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予以吸收和借鉴。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可是在早期曾出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以只有“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14]154}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就思想方法而论与“全盘西化”的文化观也是相仿的,同样是没有文化自信的表现。应当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以后不久,各种准备都不充分的情况下就迅速投入并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因而教条式地理解和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也是存在客观原因的,具体表现就是“许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10]817}因此,党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连续犯了“右”的和“左”的错误,其根源就在于照搬马克思主义“本本”和十月革命模式,致使中国革命付出了沉重代价。后来,毛泽东论述了党所犯错误的原因:“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8]610}由此也就禁锢了思想上、理论上和行动上的创造性。究其根源,也就是缺乏文化自信在理论上的表现,即缺乏理论自信。

(二)毛泽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首先,毛泽东一方面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又明确反对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毛泽东指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了解了

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代,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14]283}马克思主义是与近代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科学理论,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近代中国革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机械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而是要在充分认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情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并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正如李仁卿等在《毛泽东早期青年教育思想管窥》一文中所说:毛泽东“强调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如何在研究现实问题中得到解决问题的方法”。^[15]这样才能以科学的文化观即文化自信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1930年,毛泽东撰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明确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4]111-112}同时,毛泽东还在这篇文章中充满自信地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4]115}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种自信,也就是说以文化自信为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当时在党内未能占据主导地位,还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16]

其次,毛泽东通过总结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解决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问题。那种缺乏基本的理论自信只会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本本”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内占据主导地位达4年之久,使得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中共中央和红军相继放弃南方革命根据地被迫长征。“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前,红军曾发展到30万人。由于党的领导机关所犯的错误的严重,革命遭受到严重的挫折。三支主力红军会合时,已不足三万人。”^[17]毛泽东在研究革命受挫教训的基础上撰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分别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角度,论述了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本本”的惨痛教训,提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即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近代中国革命实践的方法论。

再次,毛泽东提出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论断。他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18]《毛泽东选集》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表述修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9]534}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这一表述的含义作了如下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19]这是何等的文化自信,如果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是不可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信的。正如王建国在《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化(1921—1945)》一文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巨大理论勇气。”^[20]

1949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际,毛泽东非常自信地说过:“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21]1516}这是从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回顾中形成的结论,历史发展的进程也证明了毛泽东所做结论的科学性。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有了上述历史性的伟大变革。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21]151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表明近代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即为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客观条件),又表明近代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即为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主观条件)。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革命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失败告终的,究其原因,虽然可以从多方面分析,但不能不说也是与缺乏科学的文化观相关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早期也曾经历诸多失败,是毛泽东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提出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参考文献:

- [1] 金冲及. 毛泽东传(1893—1949)[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33.
- [2] 魏源. 魏源全集:第3册[M]. 长沙:岳麓书社,

2004:1.

- [3] 汪澍白. 艰难的转型: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宏观考察[M].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 [4] 冯友兰. 中国现代哲学史[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 [5] 胡适. 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439.
- [6] 汤用彤. 汤用彤选集[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493.
- [7] 陈邵桂. 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自信思想及其现实意义[J]. 毛泽东研究,2017(3):82-92.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 毛泽东早期文稿[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428.
- [9]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0]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1]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92.
- [12] 孙中山. 孙中山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948.
- [13] 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自述:增订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45.
- [14]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5] 李仁卿,任保印. 毛泽东早期青年教育思想管窥[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2(2):69-73.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359.
- [1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127.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51.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26.
- [20] 王建国. 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化(1921—1945)[J]. 毛泽东研究,2017(2):33-42.
- [2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蔡燕飞